

2012 中国杂文年选

China Satiric Essay 2012

鄢烈山 编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2012 中国杂文年选

China Satiric Essay 2012

鄢烈山
编选

花城
年选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2中国杂文年选 / 鄢烈山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707-3

I. ①2… II. ①鄢…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6134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欧阳衡 林 菁 秦爱珍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5 2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鄢烈山

2012年注定了是重要的，也是热闹的一年：一方面，如同在美国是“大选年”，在中国，是执政党中央委员会的“换届年”。非但有预定科目，更有不在预案的自发节目，最大的两件：一是所谓“重庆模式”的要角王立军出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以及主角薄熙来的倒台；二是由日本政府违反“搁置争议”的共识进行“购岛”挑衅而引起的钓鱼岛风波。薄王事件不仅暴露了他们主推的所谓“唱红打黑”的伪善，也引起大众对“文革”死灰复燃的警惕。而在钓鱼岛事件中，波及国内的“抗日”游行示威中所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行为，更让我们看到“文革”悲剧重演的严重可能性。

因此，今年的杂文有一个重大主题是关于“文革”的。曾颖的《应该从“怀念‘文革’”声中反思些什么》，是就其大者而言；王彬彬的《“文革”时期的农村工分问题》等篇章，则是就相对具体的问题反思“文革”。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关于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本书里三叶徐的《我对钓鱼岛的承诺》、王石川的《做公民，为晦暗注入亮色》，都表达了一种理性的态度。

不但在上述两件大事上，在一般共同事件争论中也常见有“文革”遗风。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给对方扣的政治帽子是“反革命”或“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如今则动辄指人为“汉奸”、“带路党”。所谓“文革”遗风有多种表现：斗争哲学，仇恨心态，两极思维，非友即敌；“唯我独革”，不容异见，对方或是“汉奸”或是“五毛”，或是敌人或是“病人”，或是“既得利益者”或是“犬儒”；党同伐异，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不辨真伪只分帮派搞“站队”；崇尚暴力，践踏法律，要么以“阴谋论”诛心追动机问罪，要

么只要“大方向正确”而不管手段是否正义……这些年特别是今年，让很多人清醒地体察到清除“文革”遗毒有多么重要和艰难。

这本年选并不是“文革”反思专集。作为导读，为节省篇幅计，下面把本书入选的杂文大致分类，并结合推介最优篇章和年度最优作者来谈一谈。

通常意义的现代杂文（不包括文书、书信、演讲等应用文之有文采者），大抵可分四类。

一是时评类。鲁迅说杂文是“攻守的手足，感应的神经”，可以理解为所有针砭时弊的杂文的起兴和立意，但这里所说的时评类杂文对时局和新闻“实事”有更直接的言说。刘敏的《赶快收拾人心》，就是对时世大局的警世钟，这个不惮雷同的题目就引人联想。文章痛切地说：“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新的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资源从哪里来，政府将如何重新树立公共权威性，都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景。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全文转载了《长江日报》7月31日发表的这篇社评，“人民时评”作者祝华新在评湖南上访母亲唐慧被劳教案时，特别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吴非的《吴景彪，你哭什么呢》则是新闻时评类杂文的代表作。它不是简单的一事一议，而是借一典型人物命运而讨论体育精神的作品。

第二类是学者型的杂文。它又可分为侧重思辨的与侧重文史知识的两种，前者可叫思想随笔，后者可叫文史札记。本书中前者如刘瑜的《恶之平庸》、王晔的《美国何以保护说谎的自由》、邵燕祥《对“团结，教育，改造”的反思》、李铁的《“贞操女神”，不傻不天真》；后者如徐迅雷的《319字的非凡妥协》等等。当然有时你很难分清一篇文章是文史知识还是思辨成分更多些，比如张鸣的《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端木赐香的《鸦片战争：民众缘何成看客？》，既是观点驳证，也是文史知识，总之是学者路数的。

第三类是文学型杂文，如果你要说杂文就是文学的一支呀，那这里就是指纯文学型的。岩泉的“讽刺诗”有写实，是杂文；周实的短诗《有些时候》，是“朦胧诗”也是“随感录”。孔曦的《千爹新赋》，赋体其表，内核是讽时忧世的杂文。当然，更多的是散文随笔这种文学样式。比如魏英杰的《香港：一座值得尊重的城市》，你可以当游记读；它们都以观点针对性很强，所以是杂文。这里特别要推介两篇好文章：一是上海市江苏路第五小学三（七）班杨芷湄同学（网名“蟹妹”）的《爸爸，请您“跪”下来跟我说话》，夹叙夹议，很诚恳，也以其（美国大使及普通人对孩子的态度，中国人包括自由主义者对孩子的态度）对比鲜明，令人心灵震撼。谁说文化与“文明”（生活方式）没有高低文野之分！另一篇是蹇庐氏的《足之随想》。它不是寓言胜似寓言，有科学依据，有生活质感，

平实地讲了怎样才能“维稳”的大道理：三足可以鼎立，四只脚椅子才能安稳——“不能此长彼短，或者说，给某脚多一点，让某脚则少一点，否则，四脚就很难齐心，不齐心，何求稳？同时，地面也必须平，唯地平，椅方能稳，所谓平稳平稳，有平才有稳，求稳必先求平。”我怎么就没观察到他说的“比如，冰箱的求稳，就是四脚中三只固定一样（长短），余一脚灵活，以随地调整其高低”？

第四类就是很难归于时评、文史或思想随笔，也明显与纯文学样式不同的，真正的杂文——文体杂交出来的杂文。你看杨于泽的《航母上的中国》，是时评，又是文史随笔，又都不是；题材重大，论的是国人的航母情结，谈古鉴今很合适，呼唤的是什麼，欲言又止，点到为止，但你懂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东江先生这些年在时评与文史随笔杂交方面的建树。从收入本书的《食无肉》、《××体》可以窥见其写作特点。要知道，这是发表在《南方日报》封二版的时评，不是发在副刊的读书札记。通常是当天下午根据新闻定选题，当晚交稿付印。他的“夹袋”里哪来那么多文史典故，旁征博引？有人哀叹“杂文”被“时评”抢了地盘，田东江证明，那是他的实力不够！

下面介绍一下，在编这本杂文年选过程中，我最欣赏的作者。这是撇开两种作者不谈，一是篇篇精彩的专栏作家如徐贲、吴懿、张鸣和杂文家邵燕祥、陈四益、徐迅雷、陆春祥等人；二是偶尔露峥嵘的普通人与网络“无名氏”——他们有些杂文“作品”比专业作者更出彩。如最近央视记者问“你幸福吗”，那个“路人甲”说“我姓曾”，这一问一答就构成精短的杂文，比装疯卖傻捧哏逗哏的相声段子还有余味。

本书选了吴钩的三篇读史札记，篇篇都很精彩。讲明代在建筑物上刻勒工匠之名防粗制滥造的制度，讲宋代相当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讲晚清资政院的议员是如何开会的，尽管都是观照现实的选题（即借古讽今吧），却不是随意的借题发挥，而有严谨的立论学术依据。从前，我们“厚今薄古”，用莫须有的“封建社会”和“万恶的旧社会”的罪名骂倒前人，以颂今天的“伟光正”。现在虽说兴国学、讲传统文化，真能像钱穆所说的带着温情看待中国历史的人并不多，吴钩就是一个。吴钩不像张鸣、宋石男和端木赐香是大学教师，业余作者有此等功底殊为不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汪强。且看本书选取他的两篇。《麻雀为何要自由》说，这麻雀真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却不是为了开发智慧，也不是为了什麼民主权利和普世价值，“只是出于它们的天性。有自由，它们就感到快乐。没有自由，它们就感到不快乐。仅此而已。”而“人来自于动物界。人爱自由，首先也应该出于本能，是为了快乐。”讲得多么单纯多么质朴，又多么深刻多么透辟！讲民主宪政“常识”，就应该这么深入浅出，这比引经据典掉书袋更有说服力。《过激分



子阿 Q》评点阿 Q 的言论，表明欲加之罪，毫无行动力和新思想的老 Q，也是可以成为维稳对象的。把《阿 Q 正传》解读到这个分上，真叫人哭笑不得。瓜田老师讲杂文要看重艺术性，汪强的杂文可以作范文了。

好了，不必把好文一一列举。是为序。

2012 年 10 月 10 日

Contents 目录

001	鄢烈山	序
001	张 鸣	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
003	徐迅雷	319 个字的非凡妥协
005	陈四益	选择
006	刘 瑜	恶之平庸
008	宋志坚	银川与羊及其他
009	沈 栖	有“宽容”胡兰成的一天吗？
011	黎 明	一棵榆树，拖出一部历史
013	宋石男	清代官员的革职与复出制度
015	朱大可	“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017	金 新	“过去的中学”因何“不过去”？
020	王彬彬	对真实的恐惧
022	张心阳	个人挂像越多的国家政权越危险
023	向继东	还得“回到蔡元培”
026	蒋 萌	今天，你是否仍怀良善之心？
027	狄 马	夺了鸟位又如何？
032	长 平	“人票”的功效
033	郭振亚	选择的焦虑与选择的恐惧
035	杨光洲	为什么要善待农民工
037	叶匡政	123 岁的希特勒究竟在想什么？
039	李 铁	“贞操女神”，不傻不天真
041	姚志勇	“淡定”的中国人

- 043 孙振军 乡下住几天 灵魂通通电
- 045 赵健雄 给自己看病
- 046 魏剑美 真理的敌人不是谬误而是压制
- 048 黎 明 狗屎也是生产力
- 050 陆春祥 感恩所有和尔俸尔禄
- 052 宋志坚 中国的股奴是怎样铸成的
- 054 郭庆晨 “纳入干部的政绩考核”
- 056 陈庆贵 痛打“狗心理”
- 058 潘 真 草婴的价值依然被忽视
- 059 阮 直 现代隐士要隐啥
- 061 徐迅雷 从草房到豪宅
- 065 邵燕祥 对“团结，教育，改造”的反思
- 066 赵 畅 从“慈禧太后的‘怪癖’”说开去
- 068 吴 钩 宋代的“福利国家”气象
- 070 徐 勤 我们能否不活得这么累？
- 071 滕朝阳 人有病，熊知否
- 073 宋石男 明代厂卫的秘密拘捕和黑名单
- 076 吴 澧 中学里那些无用的课
- 077 田东江 × × 体
- 079 刘 齐 “旧政权”的印章
- 081 王彬彬 “文革”时期农村的工分问题
- 084 张 鸣 只能听明白权力声音的人们
- 085 易国祥 要“智囊”不要“字囊”
- 086 林 达 美国社会的现代病和零容忍
- 088 孙玉祥 不同地方发生的拼写错误
- 090 洪巧俊 “大衣哥”的一曲悲歌
- 092 杨益萍 从细节看差异
- 093 端木赐香 两套语言系统
- 94 符 号 “桥上看风景”与“楼上看你”
- 96 陆春祥 “显贵”转了四个弯
- 97 许家祥 我是潜在的贪官
- 99 端木赐香 鸦片战争：民众缘何成看客？
- 100 孙贵颂 听经修炼变魔鬼
- 102 林永芳 我讨厌做一只每天被拔毛的病鹅
- 103 杨芷湄 爸爸，请您“跪”下来跟我说话
- 105 蹇庐氏 足之随想

106	廖保平	言必称“顶层设计”当戒
108	徐 贲	慎谈美德也许正是一种美德
109	曹 林	要“舌尖中国”不要“舌尖爱国”
111	朱国良	可贵的“心有主”
112	阿 敏	适应难度
114	戴志勇	不能设想没有梦的人生
116	孔 曦	干爹新赋
117	齐 亮	爬着的学生和流着泪的老师
119	彭友茂	幸福得一塌糊涂
120	王乾荣	山丹丹为什么红艳艳
122	严 遥	爱尔兰球迷的掌声最精彩
123	詹苗康	难以想象的迅速
124	朱铁志	云中谁寄锦书来
126	石 飞	两劫脱逃
128	徐怀谦	清虚之美
129	吴志实	试验可以示范不成
131	刘兴雨	五四运动的背后
134	鄢烈山	昂山素季为缅甸做了些什么？
137	魏英杰	香港：一座值得尊重的城市
138	张桂辉	放着金矿而不采
140	周春华	头文字“最”与贝勃定律
142	单士兵	一块乌木引发的产权痛感
144	王 晔	美国何以保护说谎的自由
146	朱大路	赫鲁晓夫的细腻
148	陈 仓	“运动治”简析
150	李兴濂	看皇帝怎么拆迁
151	郭兴文	古今卖官之异同
154	乔志峰	为什么孔融必须“让梨”
155	叶延滨	甫志高吃过的牛肉干
157	张林华	你理应是历史的一部分！
159	刘 敏	赶快收拾人心
160	于 坚	孔庙门前的石狮子
161	姚 宏	李世民的民主艺术
163	吴兴人	“高考状元”今何在？
165	吴 非	吴景彪，你哭什么呢？
167	王万然	从勃列日涅夫给自己挂勋章谈起

169	王 晖	自造佳话
170	汪 强	过激分子阿 Q
171	田东江	食无肉
173	侯志川	“一分为二病”
175	刘诚龙	新闻牌民心之大宋制造
178	林文祥	“鸡”同“鸭”讲
181	吴 钩	明代人是如何对付“豆腐渣”的？
183	杨耕身	有一种欲哭无泪叫热点新闻周期律
185	曾 颖	应该从“怀念‘文革’”声中反思些什么？
187	汪 强	麻雀为何要自由
188	商子雍	有趣的轮滑
190	三叶徐	我对钓鱼岛的承诺
191	郭宇宽	金灿灿的大腕表
193	郭宇宽	谁家孩子该优先上国立大学
194	赵健伟	“草泥马”与国骂
197	潘采夫	《窃读记》成了“窃改记”
199	陈 仓	专家学者论说老汉骑驴
200	王石川	做公民，为晦暗注入亮色
202	高 低	“首席”的扩容
203	刘才文	没说去白宫打牌
205	潘 沁	从人性出发
207	汪金友	腐败临头
208	余以为	在流民中找到可以对话的“林祖恋”
210	吴 钩	清末资政院是怎样开会的
212	杨于泽	航母上的中国
214	苏中杰	乌龟是如何退化而来的？
215	刘 阳	原来偶像是男人
216	陈 扬	走后门的人情腐败
218	岩 泉	杂诗 9 首
226	周 实	有些时候
228	瓜 田	我为什么看重杂文的艺术性

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

张 鸣

关于清朝的灭亡，一个流行甚广的说法是，由于清政府没有加强媒体的管理，在新政期间，媒体总是发布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作负面评论，清朝，实际上是被媒体搞垮的。类似的“结论”，有时也被用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上。在某些人看来，媒体即使不是旧政权倒台的元凶，至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手。

不错，“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全国多数的媒体，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党人办的媒体谎报战况，其他媒体也跟着起哄，报忧不报喜。但是，这场革命，却不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起义发生的1911年初，武昌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媒体事件，“大江报案”。此案的发生，是由于这份具有革命党背景的小报，的确违反了清朝的报律，公开刊登鼓吹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文章。政府按律纠治，将主事人送上法庭，按道理，无可厚非。但尽管如此，这种政府整治媒体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全国舆论的一致不满，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没有太多政治立场的报纸），都一边倒地声援《大江报》。而武昌当地的市民，也大多同情被关押审讯的两位报人。耐人寻味的是，报纸鼓吹暴力革命在先，并没有激起武昌新军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们的响应，而后来事情闹大，报纸遭到迫害，也没有引起士兵们的义愤，进而采取革命行动。随着两位报人詹大悲和何海鸣的银铛入狱，案件居然平安结束。跟远在广州的革命党起义没有关系，跟后来的武昌起义也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清政府开放报禁，革命党人回国办了很多报纸。在日本办的机关报《民报》，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革命党人编印的反清小册子，《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以及《革命军》《猛回头》等等，也在一些学堂流传。但是，很快革命党就发现，单纯地办报鼓吹革命，影响甚微，不仅报纸很容易被查封，就人家不查封，也没什么销路。要想有影响，只能臭当局，多报负面新闻，就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糗事，发布评论。这样一来，即使革命党的报纸，也跟当时销路甚广的《申报》，《新闻报》区别不大了。因为这种报纸，只要打探到政府和官员的不当或者贪腐行为，照例会一顿炮轰，穷追猛打，绝不轻饶。但革命党也只有这条路好走，只有这样，才能有销路。革命党人在北京办的《国风报》，一直惨淡经营，只有在抓住山西当局的“文交惨案”大做文章，才造出一点声势。

可是，事实上，媒体，包括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报纸，如此作为，并没有撼动这个政府，反而帮助了政府整顿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收敛。权倾朝野

的庆亲王奕劻的公子载振担任商部尚书，开会和同事叫了几个妓女，居然也被报出来，丢了官。这对于已经习惯了闲来无事逛胡同的京官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震撼。原本，新政开始之时，清朝统治已经差不多 250 多年了，整个统治机构已经严重老化，吏治腐败，玩忽拖沓，已经病入膏肓。朝廷依靠这样的机器进行变法，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但是，由于新政是一种开放式的改革，在野的士绅和绅商凭借地方自治，咨议局的选举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组织，高度参与。媒体又从旁批评，起到了监督作用。结果意外地吏治竟然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更新谈不上，但至少作恶收敛了许多。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列举的官员劣迹，其实到了新政时期，已经大有改观。况且，除了革命党办的少数报纸（销路和影响都有限），当时主流媒体所主张的价值，比如立宪，文明等等，在改革中的清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向这方面靠拢。包括原本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如果报纸抨击说留辫子不易于卫生，一些政府官员都会很听得进去，对剪辫子的下属，听之任之。

现在史学界已经承认，新政时期的成绩还是很可观的。不仅政府的军事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有序地进行，而且在关税和盐税都抵押支付庚子赔款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居然能从不足一个亿，达到近三亿两。多数的省份，都有结余。投资增加，新的企业接连兴办。社会秩序也比庚子义和团时期，好了不知有多少倍。1950 年代史学界统计辛亥前一年全国的民变，说是有一万起，但资料罗列出来的不过几百起。即使后来发生了革命，民众也基本上没有参与，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并不反感，即使在革命发生的权力真空时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杀官事件（这在以往的朝代更迭中，是常见的）。这一切，跟媒体的批评监督，不无关系。他们的批评，即使具有相当恶意，甚至居心叵测的攻击，也在事实上给政府加了分。

我们知道，革命党人一直在搞起义暗杀，但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机会，真正有了机会，还是因为清政府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盲目而且专横地收揽权力，直至出台皇族内阁，专横地收揽资源，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归中央，也就是由皇权独揽。这样的大错一旦铸成，得罪了最不敢得罪的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革命就有了机会。这个过程，媒体其实一直在做事实上的诤友，对这样的倒行逆施大加挞伐，可惜，当时当家的满人亲贵，听不进去。打倒清政府的，其实是这个政府自己。

（选自《21 世纪经济报道》2011 年 10 月 10 日）

319 个字的非凡妥协

徐迅雷

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共和的时候，隆裕太后心情一定很复杂，肯定不是“忐忑”两个字能概括的，更不是百年后走红网络的神曲《忐忑》那“啊咧呀咧”一路到底的心情，倒是网友“翻译”的歌词“阿姨压抑带个刀”这句有点切近。

隆裕太后带着个6岁的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母此刻已经没有多少力量了，“带个刀”也没用。她授权袁世凯去跟南边谈判，商酌退位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颁布。这是一份未有标点、正文全文才319个字的诏书；今加标点，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清帝逊位诏书》颁布，清帝宣布退位，由此结束了清王朝260余年的统治。这个逊位诏书文采斐然，浅文言，多骈句，甚至最后还用反问句抒情。诏书颁布，有着多重含义：其政治意义是标志着革命的胜利，其历史意义是结束了一个时代，其法律意义是洋溢着宪政思想，其人文意义则是和平妥协。

没有妥协，如何共和？《清帝逊位诏书》，短短319个字，有着非常非凡的妥协精神。一则告示文书，已成了一部文献。这诏书可不是隆裕太后自己写的，她哪里写得出来？“清帝逊位谕旨之文辞即在赵（凤昌）宅起草，乃出张季直手笔。”这是14岁就在横滨加入兴中会的老牌革命党人冯自由的记载。那时刻，隆裕太后显然也没什么办法，这诏书只能是“秘书”写了算了。

张季直，即张謇，清末状元，他是那么多无聊状元中难得的一个人才。张謇作

为中国的实业先驱，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声望和社会地位确实很高，被称为“绅商”。有意思的是，张謇并没有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这件名垂千古的事情。三天后，张謇看到颁布的逊位诏书时，在日记中先举重若轻、后举轻若重地写下这两句话：“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张季直是幕后英雄，袁世凯是台上枭雄。清帝的逊位诏书中，竟然三次出现袁世凯的大名。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句大白话，语感语调上不甚相称，原来是老袁在审稿时自己授意写上去的。按说，这话在逻辑上是不通的：皇帝宣布自己退位的诏书，怎么好规定对方由谁来“全权组织”新政府？

在《清帝逊位诏书》中，与出现三处“袁世凯”相比，分量要重得多的是，同样也出现三处“共和”。《清帝逊位诏书》是不能遗忘的，就因其中的共和思想、宪政精神。著名学者、法学教授高全喜在《立宪时刻》（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一书中，干脆将《清帝逊位诏书》说成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见第83页）。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清帝逊位诏书》是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具有立国基础的宪法意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

比较遗憾的是，《立宪时刻》作者认为，《清帝逊位诏书》谁写的不重要，对张謇的着墨不多，但也说到，张謇是草拟诏书的不二人选，“张謇的立宪思想是解读这份诏书所蕴含的宪法法律意义的最为恰切妥当的注脚”（见第95页）。在我看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刻，谁执笔来写，真是太重要了。换作别的人来写，仅仅只把“逊位”这层意思表达清楚也可以了。

然而，高全喜教授将《清帝逊位诏书》看成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是很有价值的。“光荣革命”意指和平过渡、没有流血或流血甚少的革命，亦即以谈判妥协为主的革命。狭义的“光荣革命”是指1688年英国的那场非暴力革命，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这场革命没有流血，因此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光荣革命”。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就源于这次光荣革命。“光荣”之革命，属于不可避免、但又相对温和的革命。光荣与梦想结合得好，当然是最理想的。

谈判、沟通、妥协、让步，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都有一点“费厄泼赖”精神，最终达成了契约协议，很多政治历史就是这样走过的。《清帝逊位诏书》也有鲜明的契约性。一方对另一方有优待的承诺，一方给另一方让出权力。“清帝不是逊位给一家一姓的王朝，而是逊位给了一个未来的立宪共和政体，这是它与中国传统禅让的不同之处。”高全喜教授后来谈到：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存在南北之争；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北方的改良主义者两种力量的妥协与折中，最后实现了合作。

与低烈度的辛亥革命相比，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内战而非革命——尽管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北方的联邦和南方的邦联作战，最终以亚伯

拉罕·林肯的联邦获胜而告终。与中国的“风从南边来”不同，美国蓄奴的南方是落后的一方。通过这场南北战争，美国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铺平了道路，更是成就了一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但这场战争的妥协性是当然不足的，没有人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光荣革命”。

中国后来也经历了三年国共内战，把重庆谈判所达成的一丁点不牢靠的妥协撕得粉碎。内战就是内战，不是什么革命。后来在台湾，蒋经国在晚年有了间接的“光荣革命”，那真是革自己的命，从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清帝逊位的“光荣革命”，当然不是主动、高姿态的拱手相让，而是情势所迫、高压所致。与政治共舞的张謇，彼时也是在情势所迫下，由一个温和而坚定的立宪人士，迅速走上了民主共和之路。曾在军中教授过袁世凯诗文制艺的张謇，算是袁世凯的老师，但他终究是教不会袁世凯领会宪政精神。武夫袁世凯有能力压倒“弱女”隆裕太后，他能够成为压垮清政府的最后一把稻草，但他也成了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把稻草。唯独裁者没有让步妥协。袁世凯终究是缺乏妥协精神、抛却共和思想的旧时代的人，在最后的最后，多少有点忐忑地登上了皇位——他拥抱了一把独裁的权柄，也斩断了自己立足的双腿。

（选自《讽刺与幽默》2011年11月11日）

选 择

陈四益

北京人艺上演了一出小剧场话剧。

故事发生在一个座镇。剧中两个插曲给人印象深刻：一位教师对孩子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好吗？”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只有一个孩子举起了小手：“我想听《哪吒闹海》的故事。”老师让他坐下，好好想想再回答。第二次问，那个孩子仍想听别的故事，老师厉喝他站起，又叫他坐下再想。到了第三次，孩子无言，他知道没有也不允许有另外的选择。于是老师说：“好！没有不同意见。”

另一个插曲发生在小酒馆。这家酒馆只有一种酒，叫做“玉钩藤”。但每次客人要酒，老板都要问：“你要什么酒？”绿豆烧、糯米酿、竹叶青，几次三番遭拒，客人终于明白：“那就玉钩藤吧。”老板充分满足了顾客的知情权。

两个插曲，事涉荒诞。



忽然想起了剧中的一句台词：有备选的人叫人家选，这是尊重；没有备选的人叫人家选，那是侮辱。

（选自《学习之友》2011年第11期）

恶之平庸

刘 瑜

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细长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薄嘴唇。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大街上到处可见。但他又不是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